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三八期 ——
(二〇〇三年五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305a)

| | |
|--------------------------|-----|
| 【史海钩沉】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 | 丁 抒 |
| 【当事者言】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 | 穆 欣 |
| 【往事如烟】恋歌 | 叶卫平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

· 丁 抒 ·

(一) 军队奉命支持“左派”镇压“右派”

一九六七年初，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倒台已成定局，举国遍地都是“打倒刘、邓、陶！”一类的大字标语。六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参与上海夺权的造反团体的贺电。全国各地的中共省委相继垮台，省委第一书记几乎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代理人”，揪上斗争台。

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接到安徽省军区的报告，请示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是否应该派部队警卫会场。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1〕

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当天发出了一份《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决定说明，“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并指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2〕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八条命令》：“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3〕

二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作了个批示，大意是：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4〕林彪将毛的“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批示转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叶又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的令箭。

但问题出来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

起来造反、力主打倒当权的“走资派”并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是毛泽东定义的左派。他原本设想的是：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夺权。但新的领导班子由原领导人中与刘、邓、陶无瓜葛的干部及军队将领掌握，加几个左派组织的代表在新政权里作点缀。可是此时已不同于文革初期，每一派都热衷于斗争“走资派”，没有哪个组织还在保省、市委，“保守派”已不存在。每个组织都要打倒“走资派”，都高喊“打倒刘、邓、陶”；每个组织都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有资格参与夺权。可谓咸与“革命”，区别仅在先后。

而这些组织又彼此对立、彼此反对，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语无法严格定义，更使“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难以操作。

军队既获得让他们“支持左派”的指令，中央又不告诉他们谁是“左派”，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去“支左”。那些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基层干部多的群众组织背后多半有“党的领导”，天然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再加上由于党领导一切，省委第一书记往往兼任大军区或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地委书记往往兼任军分区政委，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颇为惺惺相惜。对于地方干部被指为“走资派”而残酷批斗，军队干部难以接受。虽然中央说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就是“左派”，可是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核心一般是大学生，党团员少，老工人少，“成份不纯”、“行为过激”，怎么看都不像左派。要军队支持他们，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在造反派看来，省委第一书记倒了军区第一政委也就倒了，地委书记倒了军分区政委也就倒了。政委可以打倒，为什么司令员就不能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地方上有“爪牙、同党”，作为军队的政委，他们在军队里自然也应当有“爪牙、同党”。既然领导一切的党的机关都可以造反，军区就没有不可冲击的道理。更何况当时毛泽东正在支持斗争军队内的反党分子。一月八日、十八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杨勇相继被打倒、斗争。十九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和一批军队将领在北京十万人大会上被批斗。二十六日，海军政委苏振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上被斗争。因此，造反派组织无惧与军队对立，无惧冲击军区司令部。

这样一来，左派又成为毛泽东所说的右派了。

这个矛盾无解。要么夺省委权和冲击军区都是革命行动，要么都是反革命行动。说夺省委权的是左派，冲军区的是右派，行不通。至于毛泽东说的右派冲军区要追究，左派冲军区可以不予追究，就更行不通了。

更严重的是中央文件中的“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

大刀长矛时代，老百姓还可能用刀剑和军队搏杀，而今有机枪、坦克、飞机、大炮，根本不会有人以卵击石，对军队“动武”。对军队“动武”的可能性不存在。可是，“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却给了军队巨大的空间。当军队要为镇压制造理由时，只要说“对方动武，我们还击”就够了。而这是军队领导人的尚方宝剑，足以使下级军官、战士接受，把枪口对准群众组织成员，对准老百姓。

制造了青海“二·二三事件”青海军区负责人赵永夫就是这么说的。

（二）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的夺权

一月十二日，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上海造反团体的贺电的第二天，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的权。

青海“八·一八”是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首要打击目标不是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而是第二书记王昭。

正如李葆华在安徽饿死二三百万人后于一九六二年初被刘、邓派到安徽取代曾希圣，王昭也是在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语），造成大饥荒，人口近百分之十非正常死亡后调去的。安徽有人称李葆华“李青天”，青海也有些老百姓称王昭是“王青天”。但王昭原来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副手，去青海前“彭真亲自谈了话，罗瑞卿保驾的。”既然文革以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发轫，“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自然认为王昭是“彭、罗安插在青海的死党分子”，应予打倒。（5）

青海省军区内部对王昭是否“走资派”、是否应予打倒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王昭应该打倒。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的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而赵永夫心里对“八·一八”恨之入骨，在党委会上却不情愿地表态同意支持“八·一八”。

青海省军区内部，赵永夫的支持、追随者是多数。当时，毛泽东对是否许可军事首脑机关成立群众组织和夺权还没有明确的指示，有关政策相当含糊。（直到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才发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说“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夺权和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赵永夫的支持者便利用此政策含糊的空间，效仿地方群众组织，在省军区党委决定支持“八·一八”三个小时后，起来造反，成立“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他们宣布省军区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无效，夺了刘贤权的权。刘贤权被软禁在家，电话被切断，住处放双岗，警卫员、秘书不得与他接触。他们拥戴赵永夫，赵则以“顾问”名义成为指挥部乃至军区的实际领导人。

一月二十五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获总后勤部青（海、西）藏办事处主任张晓川支持。赵永夫成为青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当然不卖赵永夫的账。他们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提出“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

此时，中共青海省委内部也严重分裂。王昭早于一月中旬离开青海治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支持“八·一八”打倒第二书记王昭。“夺权”受中共中央支持，无法抗拒，与其被“夺”，不如交权。杨植霖几次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因此一月二十九日青海“八·一八”的夺权，毋宁说是省委、省人委和平转交政权给“八·一八”。

其实，全国各地夺了权的“左派”都没有掌权。所有的造反派都是在替中央文革、替毛泽东“夺权”。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国家是共产党的，掌权的必须是共产党的官员，这是极其自然的事。造反派的历史使命只是帮助毛泽东打垮刘、邓那条线的人物，现在毛泽东已用不着他们了。毛泽东安排了军队“支持左派”，实权落到了“支左”的军队手里。

青海也一样，由于杨植霖、刘贤权、张江霖皆较软弱，强悍的赵永夫控制了军队，也就控制了青海全省。二月四日，软禁中的刘贤权起草了一份电报，说“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将电报发给中央，被赵永夫拒绝。刘的夫人安绍杰将电文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兰州，由兰州军区发给中央军委。但未获回应。

因此，“八·一八”名义上夺了权，其实只是得了几枚公章，并无任何实际权力。他们惟一夺到手的，只是一个《青海日报》社。

（三）赵永夫军管《青海日报》不成

青海对决之势十分严峻：赵永夫及其在省军区内的追随者对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省军区司令刘贤权、副司令张江霖；“红卫兵总部”、“捍卫队”、“贫下中农红卫军”对“八·一八革命造反派”。

这时，由于对方攻击其组织“不纯”，“八·一八”的主力“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纯洁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整风”，将几个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要求公安部门严肃处理。结果给正在伺机行动的赵永夫和张晓川一个出手打击“八·一八”的机会。

二月三日，张晓川掌管的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出动青藏公路使用的二百五十多台军车，省军区的部队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全城游行。他们把“八·一八”交出的“反革命”、“坏份子”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借以向“八·一八”示威。

这使双方对立局面更加激化。二月四日，青海大学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而赵永夫和张晓川也决心打垮摧毁整个“八·一八”组织。军权、政权都在他们手里，摧毁“八·一八”是其既定方针，问题只在何时动手。

中共明文规定，×省日报都是共产党×省委员会的机关报，此外并无省报。可是此时青海省委已交权瘫痪，《青海日报》在“八·一八革命造反派”控制之下继续出报。赵永夫等视该报为眼中钉，起先想封闭报社，未获省军区领导层的支持。此时已有一月二十九日天津警备区对《天津日报》军管的先例。赵永夫等遂转念，决定由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

二月十四日，军管小组到报社。但占据报社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组织动员守卫报社。西宁市各“八·一八”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报社原有二百人左右，各成员组织派去近两千人守卫报社，相当拥挤。当时气温很低，有的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

赵永夫调动军队封锁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桥，暂时没有动作。军队不许运送物资进去，但许可人员出入。烧煤用尽后，守卫在报社的人只能喝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充饥。有的家属给他们送饭送水。成百人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去棉衣。“八·一八”控制报社继续出报至十七日。

十五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连日游行支持对《青海日报》社军管。但青海省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给赵永夫发去“三条指示”，要求部队撤离报社。赵永夫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等十二人到兰州军区抗议，要求收回“三条指示”。而兰州军区把要求青海军区将部队撤离报社的指示用电话传给了“首都三司联络站”和“八·一八”。“八·一八”更坚定了守卫报社的决心。

十九日，“八·一八”等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军管《青海日报》。途经《青海日报》社时遭对立派阻拦。“八·一八”的车辆不慎压死了捍卫队成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拟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二十日，捍卫队抬张桂兰尸体游行。次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组织调动十万人，再次抬张桂兰尸体环城游行，并沿途砸“八·一八”等组织的办事机关。

（四）赵永夫决定武力强占《青海日报》社

双方在《青海日报》社僵持的几天当中，青海省军区向中央发了十几份电报，但未获明确指示。据当时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林彪“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6〕

中央对青海事态虽不表态，但实际上正在全国支持军队“镇压右派”。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的“坚决反对右派”、“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已在有的省份实施。

二月四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7〕于是湖南驻军和公安局在与造反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的帮助下大逮捕，全省约十万入狱。〔8〕譬如黔阳县，“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的骨干四百余人被拘捕关押。〔9〕

成都军区于二月十七日开始在四川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抓了数万人。〔10〕如安岳县公安局于二月十九日以“反革命罪”拘捕一百多名造反派，取缔了二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同日，宜宾县公安机关逮捕、拘留九百余名红旗派成员。〔11〕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镇反”。赵永夫和张晓川知道形势对他们很有利。二月二十一日，他们再次主持会议，确定二十三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青

海省军区党委常委除刘贤权表示不同意以外，意见一致。他们拟定行动方案：“如果（“八·一八”）用刀子、斧头、武器进行顽抗，就坚决予以镇压。”二十二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任务，说：“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二十三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召集动员会议，强调说：“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12）

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时，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表通令：

一．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三．对受蒙蔽的群众一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他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办。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回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八．（略）

与此同时，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十三个连，团团围住《青海日报》社。赵永夫在临近的宾馆四楼指挥，后为安全改到二楼。

（五）文革中首次大屠杀

青海日报报社地势较低，架在周围楼房、高地的机枪居高临下，报社内的人不可能抵抗。双方只是等待。

上午十一时，军队枪击报社外的“八·一八”的广播喇叭，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哑。

下午近二时，赵永夫所在的宾馆和报社后们临河的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

守卫报社前院大门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13）

“二十二日晚，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给她守报社的爸爸送饭，由于天晚了，她爸爸不放心，没让她回去。第二天她爸爸中弹后，她扑在她爸爸身上痛哭不止。这时一梭子弹打过来，她就被当场打死。她爸爸至今尚在，谈起非常伤心。”〔14〕

后来周恩来处理青海二·二三事件，接见青海代表时，让清华大学学生许宝生汇报当时的情况。许说：“一个解放军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15〕

赵永夫还调去一个喷火器班。但由于“八·一八”没有武装，无力还击，喷火器未用上。

军队未遇抵抗，仅用了二十分钟就轻易占领了整个报社大院。二时半左右，报社内幸免于难者一千余人全部被押到操场。据被俘的师范学院的红卫兵说：“捍卫队的人纷纷跑来，在（被俘者）人群中走来走去，从八·一八派的大队长到小组长以至一般成员，全被抓出来，高举双手跪在地上。”“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说：‘八·一八先开了枪。’并且煞有介事地和一些俘虏堆中找机枪射手。”〔16〕

（六）赵永夫编造“八·一八”开枪的谎言

枪声停止后。赵永夫、张晓川等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死的人太多，便指示部队迅速将尸体拉走、掩埋，并层层传达编造的统一口径：“八·一八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五人，才开枪还击。”“他们自己用机枪督战，打死四十余名。”部队进攻时，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朝过道撤退，有几个人被设在临近科委大楼门口的一挺机枪从背后扫倒。事后，军队说他们“背上中枪，是八·一八自己打的。”

军队共死亡四人，但那不是被“八·一八”成员打死，而是被参战的战士误伤的。由于部队从报社前面、旁边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开枪，而报社范围仅一百米见方，有战士被对面的火力击中。据《青海日报》记者周衍庆目击：“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背着另一个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另一个解放军同志用手按成喇叭形呼喊：‘别打，是自己人。’这样对方才停止射击。”〔17〕

周恩来处理青海事件时，有人汇报说：“一个小女孩身上中了三枪，解放军问谁打的。她说是解放军打的。那个人讲：‘你说是八·一八打的，我你养伤治疗，你说是解放军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小女孩说：‘我看见是解放军打的。’于是被送进监狱。”〔18〕

青海军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八·一八”有枪、有机枪。后来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青海代表时，周恩来说：“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现场有没有？”（赵永夫回答含糊）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永夫：“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但没搜出来。”

周恩来：“现场上怎样？”

赵永夫：“有弹壳。”

.....

周恩来：“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那么多群众vi”

.....

周恩来：“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除非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

周恩来：“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赵永夫：“死伤二百六。”（实际平民死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队死四人，伤四十六人。（19））

周恩来：“你去现场看了吗？”

赵永夫：“没有。”

周恩来：“这么大的惨案，你身为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吗？”

.....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当场宣布对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20）

（七）赵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

事件发生于二月二十三日，而上述周恩来出面处理是三月二十四日，隔了整整一个月。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共中央至迟第二天就知道了。三月二十四日林彪的夫人叶群说：“二十四号听到此事，死亡那么多，（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21）可见事件一发生毛、林就知道了。但叶群所谓毛、林“非常生气”却是十足的谎言。毛、林根本不需“非常生气”，只要一个简单的批示，赵永夫马上就得负荆请罪，哪里还用得着等一个月！

事实是，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林彪都着眼于保护军队，不打算处理此事。当时毛泽东刚将冲击部队的组织定为右派，批准军队镇压，所以不想把火往军队引。林彪秘书张云生说：“主席最初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主席已有过内部指示：对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对和冲击解放军的右派群众组织，当一再的说服工作和忍让态度不能奏效之后，可以进行镇压。”（22）

中央文革欲将此事定性为军队血腥镇压红卫兵的事件，以便打开缺口整肃叶剑英、徐向前等军队领导人。无奈毛泽东不予理睬，中央文革奈何赵永夫不得。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周恩来当然不会有所动作。据张云生分析：“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似乎是尽可能稳住部队，并给那些把造反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右派’以有力的回击。因此，尽管中央文革印发的告状材料写得感人肺腑，并未受到最有权权威方面的理睬。”（23）

“二·二三”当天，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但不知为什么消息到了西宁大街上，“叶副主席”变成了“林副主席”。秘书向林彪报告说，西宁传说“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彪听了一笑了之，不加评论，不置可否。（24）

有中央军委撑腰，赵的胆子也壮了。据刘贤权说：“二十四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十二人。”（25）

赵永夫继续“平定反革命暴乱”，在全省范围镇压反革命。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〇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〇四人。”（26）“一个牢房是两层铺，原来最多住二十四人，但塞进了七八十人，甚至有塞进一百多人的。有个牢房由于关人太多，上层铺坍塌，压碎一个人的脑袋，当即死亡。看管人员说：‘反革命死了也活该’。”（27）在贵德县，“武装部执行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命令，对全县‘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头目及部份成员，逮捕入狱；副县长曹廷九被扭送监狱。”（28）

三月八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指示刘贤权、赵永夫、张江霖三位司令都到北京。他们到北京时，“军级干部会议”（后来又叫“军以上干部会议”）已开了两个星期。赵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在会议上他被安排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他借机自我表功，吹嘘“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据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后来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时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作了记录和录音。”（29）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青海代表时，叶群也对赵永夫说：“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30）

由此可见，叶剑英把赵永夫请到北京，就是要他向各地的军队领导人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

（八）为平定“二月逆流”而处理“二·二三事件”

但就在这时，毛泽东改变主意了。当他发现对文化革命表示不满的元帅、副总理们是最大的威胁时，他对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态度就变了。他要回击几位元帅、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反对文化革命的“二月逆流”，所以当中央文革张春桥等给他写信要求重新审查此事件时，他于三月十一日批示道：“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31）

叶剑英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等人因为“二月逆流”问题而摇摇欲坠。为保自己，只好丢车保帅。叶剑英和徐向前都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承认对青海事件处理错了。（32）

对青海事件一直不加评论，不置可否的林彪开始表态了。三月二十日，他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毛泽东听了林彪讲话的录音后，指示把该录音大量录制，发给全国各地播放。（33）

直到这时，一直没明确表示意见的周恩来才着手出面青海“二·二三事件”。他接见青海代表，宣读中央关于处理青海问题的决定，为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青海“八·一八”平反，甚至指挥战士当场撕掉赵永夫、张晓川的领章、帽徽，押走。

可是，如果叶剑英、徐向前等没卷入“二月逆流”，毛泽东很可能不会改变对青海事件的态度，赵永夫将继续当他的“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青海“二·二三血案”的冤魂也就将含恨九泉，永无翻身之日了。

注释：

1.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84页。
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杭州：浙江省联总，1968）第111页。
3. 同上，第114页。
4.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87页。
5. 1967. 4. 20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1967）第45页。
6.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1页。
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99页。
8.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1994）第90页。
9. 《黔阳县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32页。
10.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3页。
11. 《安岳县志》第30页；《宜宾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91）第456、457页。
12. 一九六七年四月青海军区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宣传材料，《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9、53、54页。
13. 《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36页。
14. 同上，第38页。
15. 1967. 03. 24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13页。
16. 《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33页。
17. 同上，第36页。
18. 1967. 3. 24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纪要，《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14页。
19. 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第435页。
20. 同上，《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7至10、15页。
21. 1967. 03. 24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15页。
22.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6页。
23.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2页。
24. 同上。
25. 1967. 4. 10刘贤权在青海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21页。
26. 同上。
27. 《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38页。
28. 《贵德县志》（1995）第28页。
29. 1967. 4. 20安绍杰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44页。
30. 《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9页。
3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04页；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6页。
32.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103页。
33. 同上，第101至102页。

□ 原载《文革大屠杀》（宋永毅主编，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

~~~~~

【当事者言】

## 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

• 穆 欣 •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党内高层领导围绕着工作组的存废问题发生争论。这实质上是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的争论。主要表现为对“乱”的不同看法，是要“天下大乱”与有领导、有限制、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分歧。毛泽东是主张“乱”的。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8月23日，他又在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各地对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持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1967年夏季他在地观察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阴谋在“乱中夺权”的林彪更是唯恐天下不乱，他和江青一伙勾结起来，到处制造社会动乱。8月8日，林彪来钓鱼台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讲话时公然宣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他发表过自己的“乱子观”：“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不要只看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坏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我们的军队很巩固，我们的生产上升，一些学生、青年他们闹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么乱子，是不可能出大乱子的。这就是我们对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而党中央的多数人及党的各级领导人对这场运动的目的、方法都没思想准备，更不能理解和听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和纵容的那些狂暴、极端的言行。他们主张保持各级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对于已经普遍出现的混乱局面能够予以控制，对于正在泛滥开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狂暴的行动能有一定的约束。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常用派工作组的方法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因此，派工作组就被认为是维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当时派工作组在组织上也是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领导运动，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并且事先请示过在外地的毛泽东，征得了他的同意。中央文革小组不但没有表示异议，陈伯达还当了全国第一个工作组——中央派往人民日报社临时工作组组长。不久，这事却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指责为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成为刘少奇下台的直接导火线。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这事件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曾洋洋自得地说：“我是第一个工作组组长，又第一个提出撤销工作组！”这句脸皮厚的俏皮话，恰好道出他是一个出尔反尔的政客。

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始于1966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去北京大学。经报告毛泽东同意后，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张承先于6月1日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新华社于6月3日向全国作了报导。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派出了工作组。

工作组受到各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也遭到少数造反派的反对。江青和陈伯达、康生一伙这时乘机煽动，从中捣鬼，鼓吹“造反有理”、“打倒一切”，使群众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有些学校发生赶工作组的现象。这时毛泽东在派工作组问题的态度上有所改变。6月9日，他在杭州忽然对前去汇报运动情况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实际上，这时需要派工作组的地方都已经派去了。

6月20日前后，北京高等院校驱赶工作组的风波达到高潮。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乱斗现象。全校有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被斗，工作组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加以制止。当晚，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向全校作了广播讲话。他说，避开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今天发生的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他号召大家擦亮眼睛，不要上坏人的当。并宣布了几项规定，如以后批斗人要经工作组批准等。工作组并把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写成简报上送中央。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不少地方党委确实参照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办法，使乱批乱斗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6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都发生了造反派赶工作组的“六·二〇”事件。针对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反工作组，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陶鲁笏、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指示工作组“要沉着顶住”。何长工等地质部、中央工交政治部负责人向师生讲话，批评少数人闹事、围攻工作组，指出工作组是革命的。

6月21日，清华大学也发生反对工作组的事件。这天，工程化学系20岁的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批语，大意是：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不代表我们，要再夺权。蒯大富在前几天就提出要赶走工作组，6月24日，清华造反派在工作组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6月26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

在外地的毛泽东，看到中央转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却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变化，陈伯达和康生、江青等是清楚的。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加深了。

6月20日，即在北京不少院校师生造反派学生驱逐工作组并已知道毛泽东态度改变了的时候，陈伯达根据江青的意见，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上提出一个书面建议，其中说道：“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在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他主张撤出派到各学校各单位的工作组。

在工作组存废去留的问题上，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会上没有讨论陈伯达的这个建议，邓小平还对他批评了一顿。

这天深夜，陈伯达气急败坏地回到钓鱼台，先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了一场。之后，跟大家谈起此事唉声叹气，满腹牢骚。他说，我这个小组长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取消工作组。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理，把字条往旁边一扔，不在会上讨论。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我非辞职不可。他还毫无道理地指责出席会议的刘志坚：“他是副组长，却不支持我！”

以后，一连几天，陈伯达见人就发牢骚。当时人们在钓鱼台工作都十分紧张，每天都工作18小时以上，很少休息，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当时笔者还和陈伯达一起住在15楼，他在二层，我住楼下。平时只要没有会议，陈伯达比谁都睡得早。某天午夜，他被这事“气”得睡不着觉，下楼到我房间里，往沙发上一坐，又是牢骚连篇，说非辞职不可，还说他想到天津“休

息”，说在那里有他的“朋友”；又“骂”周扬不该这时住在那里（笔者按：当时周扬因病在天津治疗），“害”得他不好去！这位平常一本正经的“夫子”，此刻向我讲这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只是无聊的发泄。自然无须“劝说”，只好搁下事情听他。望着他那忧心忡忡、煞有介事的神色，心里不禁闪现一种轻蔑的感觉：这同某些人“撂挑子”有什么两样！

后来平静了一阵子，这桩事情却还没有完。7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宴祝贺会议成功，并与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宴会前会见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事先，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说，要陈伯达参加会见，并叫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出席宴会，新华社将趁此机会公开报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的事。我把这事告诉陈伯达，他并没有表示异议。

这天的宴会结束很晚，回到钓鱼台办完当天的事情已近午夜。这时正是报社里紧张时刻。因为多日没回报社，就赶回去看看有什么事。不料回到报社刚一上楼梯，就有人从楼上跑下来：钓鱼台来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情，叫你马上回去！

回到钓鱼台，午夜已过。径往陈伯达住处去问。他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说我不同意公开报导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根本没料想到，那么急迫地催我回来竟是为了这事。陈伯达房间里有直通总理的电话机，拿起来就可以通话。当时我想，既然这样着急，他为什么不直接早一点给总理打电话？隔壁住有两位秘书，楼下还有关锋这个“大”秘书，为什么不就近叫秘书打电话，却老远地把我从报社找回来？而且此事总理有言在先，他既然不同意公开小组长的身份，当初为何不说？刚才在宴会厅见到总理为何不说？何况这时宴会消息应是早由新华社发出、广播电台广播过了，叫总理怎么办？联想陈伯达近日那些牢骚，深感这是故意给总理出难题，通过总理向中央施加压力；同时大概也是检验我的态度。想到这里，我就对他说：“已经这么晚了，有关今晚会见、宴会的新闻，早都广播过了。全世界都正盯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时再把你的意见告诉总理，他该怎么办？如果让新华社和广播电台发出‘修改稿’，加以‘更正’，明天全世界的报纸都会把这件事作为‘头条新闻’，还会加上种种揣测和对我们的诽谤！总理太辛苦了，可能已经休息，还是别再打扰他了吧！”陈伯达听我这样讲，满脸不高兴，沉默好大一会儿，对我说：“好吧，你们都不愿意打，也就算了。”他讲“你们”，不晓得是否在我之前先曾叫别人打这个电话，别人也没有打。事后他的秘书说，在我走后，陈伯达自己还是给总理打了电话，纠缠了很长时间。总理自然不会同意他。第二天见报的这次会见和宴会新闻中，都说陈伯达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身份出席的。同时报导周恩来在宴会讲话中有“我和康生、陈伯达、陶铸三同志一起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亚非作家们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样的话。

陈伯达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意见，在7月13、19、22日的中央会议上，又连续三次提出，主张把它全部撤销。当时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立即撤出所有的工作组，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刘少奇以后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经谈到陈伯达意见被否决的情况：“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份党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4月下旬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毛泽东仍然滞留南方。6月15日，他离开杭州西行，18日到达湖南湘潭，当天回到韶山。在韶山近旁山谷中的滴水洞宾馆住了10来天，6月28日到达武汉。直到7月16日他在武汉畅游长江，18日回京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后，全国人民才知道他的行踪。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的那封信，其中谈到他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设想，是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全盘思路的重要文件。

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就要中央文革小组送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校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报；同时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第二天，他又听取了刘少奇的汇报，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对前一阶段的运动表示不满，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以后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批评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在6月3日制定的“八条规定”，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要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有人说，毛泽东回京后偏听偏信江青的汇报，决定撤销工作组。其实，江青一直留在上海，比毛泽东还晚两天回到北京。这年11月28日，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说：“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我是7月20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

如前所述，早在6月初旬，毛泽东就已改变对派工作组的态度。在促成毛泽东迅速决定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方面，陈伯达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毛泽东回京不久，便住进钓鱼台第12号楼。7月24日和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过两次会。7月24日午后，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开会，讨论准备提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草稿。这次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见面。当时他穿着一身陈旧的白色睡衣，坐在楼下大厅中央等候大家。与会者中初次见毛泽东的人，未免怯场，大都绕到他背后去就座。凡属初见面或不很熟悉的，他都回头望着询问姓名。看来这天他比较高兴，会场里气氛也比较热烈。其后他在谈话中给中央文革小组鼓劲，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等人到齐，毛泽东说：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织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坏事。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你也不行，我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要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了，或者叫观察员。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有人插话说：北大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40多人提出要撤销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毛泽东说：有的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

后来他又一次指出：有的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

从7月22日起，毛泽东四次派陈伯达、康生、江青前往北京大学去同师生见面，他们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挑起北大师生对“六·一八事件”的辩论，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毛泽东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听了学生辩论的录音。7月22日晚上，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带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来到北京大学，召集全校师生参加的万人大会，支持师生造反，反对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接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又在7月23、25、26日连续三次前往北京大学同师生见面。

7月25日，毛泽东又在12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指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他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根据毛泽东的话，北京市委很快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当天晚上，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第三次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揪斗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他们把对北大工作组的态度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康生竟在讲话中说：“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别听那一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学生办的造反小报上说，康生这样讲后，“革命师生豁然开朗，原来那些声称‘党中央派来’、‘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是假的，肯定有人在捣鬼！”7月26日，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罢张承先的官。陈伯达说：“在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问题上，争论这么激烈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赞成许多同志的意见，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接着又说：“我们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是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

7月27日，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带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又到北京师范大学煽风点火。他们原已将工作组组长孙友余撤职，但仍诬蔑工作组“斗争的矛头不是对准黑帮分子，对准地、富、反、坏、右，而是对着革命的师生。”指责“孙友余在同学中造成分裂”。进而煽动说：“工作组是石头，阻挡你们前进的道路”，“你们同学要求撤销工作组，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讨论了这个建议，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康生也诬蔑“孙友余这个组长没有把黑帮分子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同学”。他还白日见鬼，硬是闭着眼睛瞎说：“彭真大黑帮要去北大、人大准备政变，要夺取政权，孙友余却说是造谣！你们看孙友余是什么立场！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样替彭真黑帮辩护，应该不应该罢他的官呢？”

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下令撤销工作组，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28日，即以中共北京市委名义公布这个《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决定》说，“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当时在造反派中流行“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的口号，在这个“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出的《决定》中完全得到了肯定。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了北京市委7月28日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都讲了话。邓小平说：“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有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周恩来讲到时也说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最后讲话的是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经常住在人民大会堂西南角的118室，就在主席台后面右侧。这天会议中间，我偶尔走到主席台后面时，见毛泽东正坐在118室门外椅子上谛听前台

的讲话。我见他跟我打招呼，问他怎么不到前台？他微笑着摇摇头。回到前台，其他曾到后台见过毛泽东的同志都在猜他出不出来？这时刘少奇正在讲话。他说：“我也是在党中央工作的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老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他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其后他还讲到：“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种情形。……”

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出来。疾步行走带出来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去捡拾，毛泽东已到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他没有讲话），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这种情景，给人们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这次会后，北京和全国都迅速撤销了工作组。但工作组的问题还没有完，中央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长时间为此受批判。8月1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向全会作关于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时，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几次打断他，尖锐地批评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伯达接着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工作组不管怎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一般说，就是90%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在8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讲话时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是一种白色恐怖，这种白色恐怖是中央发动的”。他还在插话中声色俱厉地指斥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指责刘少奇“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毛泽东这张大字报，提出中央另外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没有点名，但是谁都可以看出，是指刘少奇等中央第一线负责人。自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斗争对象不断升级，现在终于直接点明了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所向。

这张大字报发表后，江青和康生等一伙即乘机攻击刘少奇，谢富治还攻击邓小平。而出席全会的多数人对它有意见，但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中又不敢表示。

陈伯达看到毛泽东这张大字报后，迅速写出一张《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从“理论”上加以发挥：

完全拥护毛主席八月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一个共产党员，在大的政治斗争的关键，忘记了群众，忘记了阶级分析，看不见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还进行镇压群众，这就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把党的领导从最近一两个月的错误路线引回到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党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同时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法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来完成，但没



有实现；列宁也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法国、英国来完成，但也没有实现。现实的历史可否说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中国来完成呢？看看现在修正主义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那里正从革命走向反动，走向对列宁、斯大林的背叛。难道这不像人们所说国际的希望在中国吗？

看种种因素，最关键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确实是这样，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这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不能使我们新中国在世界上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模范国家。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扫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在我们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让毛泽东思想能够为最广泛的群众所掌握，因而变成更宏伟的力量。我相信能够做到这样，中国的伟大成就将进一步像翻山倒海地激醒全世界。

毛泽东的大字报印发给全会与会者前夕，毛泽东于8月6日晚要秘书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林彪即飞回到北京，看过这张大字报，也立即表态，火上加油，就工作组问题发表了讲话：

派工作组本身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在某些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一般地贯彻了“排除干扰”、“捉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路线。

工作组有几种情况：少数对上边这条路线有所抵制，但也给运动增加了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的手脚，程度不同的犯了右倾错误。

另一种是忠实地执行了这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最甚的是发展了这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有意把一些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这些人是政治扒手，这些工作组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与所在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勾搭搭，采取联合行动，制造种种事件。对这些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对其方向性路线的错误，要彻底批判。

有些虽然撤了工作组，但其错误并未加以彻底批判，甚至由于某些人的阴谋，根本未加批判，那里的群众还未真正发动起来，打成“反革命”的同志还未平反，这些必须立即从根本上改变。

是不是每个工作组成员都是不革命的，是反革命的？每个工作组都有右派分子？要进行阶级分析。从总体看多数还是革命的，不同程度的犯了错误，极少数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是不是黑帮分子，要听听那些受害者的控诉，要看本单位群众的揭发，由那里群众决定。派工作组及工作组所执行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一切流毒必须彻底肃清。

陈伯达这时发言异常骄横。他说：“我们这些人是旁观者，旁观者清。感到工作组进去，不必要的地方太多了。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背后工作组起作用，它在那里坐山观虎斗。……这实际上不是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在想把那些朝气蓬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陈伯达咄咄逼人，越说越来劲，居然指责刘少奇：“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毛泽东：神圣不可侵犯，做官当老爷惯了。）这个问题的确存在，我碰到过很多场合。他说的就算，旁人说的就不算。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江青也在这次全会的一次小组会上怒气冲冲地说：“7月22日晚

上（汇报会）……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

工作组的问题逐步升级，毛泽东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先是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工作组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体现和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受到了长时间的批判。陈伯达对刘少奇的指责也更加激烈，曾在这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们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陈伯达始终抓住这个问题不松手，直到将刘少奇彻底整垮。

但是，历史终于无情地否定了陈伯达。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特别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为当年的工作组的问题作了结论。

□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02，作者为“中央文革小组”早期成员  
~~~~~

【往事如烟】

恋歌

• 叶卫平 •

在这烈火硝烟的年代，红色风暴中，曾悄悄绽开过的一朵并不明艳但纯洁无瑕的初恋的小花。

新年和母亲话家常。电话线那边，母亲提醒我，我的大女儿刻下正是我当年冲锋造反的岁数，一般的意气风发，也一般的“叛逆年华”。

思绪禁不住，倒流回到那举国疯狂的岁月。那狂飙，那烈火，那战歌声，那呐喊声，还有那一个影子，一个因年月的逝去而陈旧，但却永远不会被忘怀的影子……

—

1966年夏。

疯狂岁月开始，小学五、六年级的我，被列入“黑七”子弟一类。后来“越乱越好”，黑七子弟也可以拉山头造反了。于是小子、丫头们先是“拿起笔作刀枪”，一腔热血、一片豪情地，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去装点我们这南方古城的春秋。

过不久，又就着“文攻武卫”的口号，唱着“完蛋就完蛋”的战歌，到军营抢来一车车的军火，从“汉阳造”、“三八大盖”，到高射炮、平射炮，就差没有把飞机、坦克也给抢回来。

写标语，守大营，磨匕首，擦钢枪，灭火筒堵死了口子当土炸弹。一天折腾下来，毛小子毛丫头们多回家去，楞小子我却总 and 一位丫头同学留下来巡视观测。小子是有力气摆弄长短各种军械的，丫头的武器，则是一把轻巧灵便的五零式冲锋枪，就是雷锋叔叔“玉照”上端着的，枪管上有一溜粗粗的散热孔的那种。这玩意和二十响用的是同样的圆头子弹，有效射程据说只有二百米，但射速惊人，而且有雷锋叔叔作广告，因此我也喜欢摆弄这仿苏制五零式。

丫头有北方人特有的高挑身材，走起路来有点儿八字脚。她是班上的少先队中队长，她爹则是南下的“两杠两星”军官，古城里不常见到两杠的官儿，丫头因此也多少有掩不住的骄娇二气。疯狂岁月，她是红得发紫的一类，头一批戴红袖章的。哪晓得后来居然加入了楞小子的一派，大概是她的好朋友，同班的另一位“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也在这一派中的缘故。

七月伊始，天下大乱，混战不绝。有一次砸对立派总部，我带着一杆装上刺刀后，比队伍里的任何人都高出半截的笨重苏制步枪，在附近街道放暗哨、截击对方援兵，且被吩咐格杀勿论。

那是一个秋夜，路灯因为停电不亮，暗哨的观察判断，全靠街道和墙壁上那死沉沉的暗灰反光。

那时日，红色恐怖兵荒马乱，陋巷中，不说行人，就连婴孩的夜啼也没有。身后，喊杀声却越发热乎，听来是自己人在“完蛋就完蛋”的战歌声中攻上去了，只我独个儿在寒风中发着抖。

颤抖中，冷丁却见到有一个人影，从空无一人的街上快步走过来，黑影手上，影影绰绰的，是五零式冲锋枪特有的粗枪管。

早就准备好了。笨重的步枪马上指向那黑影，子弹已上了膛，但还不能开枪。黑暗中，不可能三点一线地瞄准，若一枪不中，对方的还击可不是闹着玩的。

黑影越来越近，楞小子却越来越觉得那身形熟悉，特别是那八字脚步。

“难道是她？”手指没往扳机扣下去，格杀令搁了浅。人性泯灭的年头，小子还算残存了这么一丁点儿。

黑影终于走到楞小子的枪口可以随时要命的距离。

“站住！……是你？！”我直起身来。果然是她，黑暗中，小子把她吓一大跳。

毕竟是丫头。别看她舞刀弄枪的，认出是自己人后，好一会儿她才喘得出一口大气。也幸亏她给吓懵了。换了别人，手中轻巧的五零式，马上就可以朝着声音先来一梭子再说。

我没告诉她说，咱差点儿拼了个你死我活，但，盯着平放的那乌黑的苏式步枪，那阴沉的三角枪刺，看来她也猜到了离鬼门关只差一线。是夜色，加上她的八字步，化解了一场血腥的凶杀。

她告诉我，在家睡过了头，出门时，队伍已经走了，于是赶紧捞了冲锋枪赶过来。我以状作老成的命令口气，吩咐她不要过到“前线”去，黑暗中，敌友难分，说不准哪个楞小子真会毛手毛脚地给她来一家伙。她也就顺从地留了下来和我一道蹲暗哨。

“完蛋就完蛋”正在那边唱得更红火，像是大获全胜。

提高警惕，一声没再吭。援兵没有来，我们也一枪没有放，只待在冷风中白哆嗦了半天。

激昂的战歌中，玻璃被砸得粉碎，对方的派旗被撕个稀烂，再泼上墨汁挂出来，以展示我

方伟大的征服。然后收兵了。夜，因斗士们的撤去而重又变得死一般的沉寂和寒冷。

小子心中，却留下了一丝寒夜身边隐约的女儿香。

二

后来上缴军火，枪炮都乖乖地送回军管会去了。

天下大乱那几个月，军队的枪炮不是给抢了就是藏了起来。后来，大概再乱下去就难收场了，于是，全国军事管制，且指名道姓地要缴造反派们的枪。

红太阳说了的，军队也出了头下了令，秀才碰着兵，不缴也不行。不缴枪，军队来真的你可就灰头土脸。于是枪炮一车车的往回送，还敲锣打鼓，说是“紧跟伟大战略部署”。

不过，革命继续。中国人打中国人几千年了，别的本事未必有，打自己人，勤劳勇敢，点子百出。

于是，毛小子毛丫头们各出奇谋，土法上马，大棒、钢鞭打“近战夜战”，弹弓、砖块则用来远程攻击。别小看了弹弓，百十把一起放“排枪”，没枪声，钢珠雨点般无声无息地高速飞砸过来，叫人防不胜防。中弹无疑死不了，但我却亲眼看到过战友给射坏了眼睛，二八佳丽，落得终生一目失明。

于是短刀子长棍，流着血，中国人打中国人又斗了几个月。打砸抢的战歌中，每斗到凶险时，碎砖碎瓦、碎木碎石、碎铜碎铁、碎玻璃碎瓶罐，飞蝗也似落在周遭。这时楞小子总晓得把丫头遮在身后，好让砖头瓦碎砸不着她。年纪小小，也会下意识地英雄救美。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每当楞小子到“革命据点”来，总要到处张望一下，看丫头到了没有。要是看不到，不一会儿就想再到处看上一下。要是丫头到了，脸上当然还是一副不在乎，但心里可是有些儿莫名的快慰感。

偶而跟丫头聊上几句，声调好像总会变得不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派”，不那么般硬梆梆的，连楞小子自己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丫头呢，眼睛也好像变得明亮起来，笑咪咪地，却似又有几分羞涩的样子。

每当丫头在，楞小子总想要做些什么令人瞩目的事，好让丫头多看上几眼。丫头也真的好像愿意跟楞小子待着聊着，当然，话题还是革命，但当彼此都忙不迭认同对方的观点的时候，就是傻瓜都看得出这并不像是“革命者”的讨论。

丫头还常常从家中带来些糖果、花生、水果之类，让楞小子尝个新鲜。那日子举国疯狂，这些东西只有特权阶层可以享有的。

一日，上街张贴大标语，楞小子拎着浆糊桶走在前面，听到后面的丫头，一直在和她那好朋友悄声对楞小子评头品足，然后是一阵阵低低的嬉笑声和善意的挖苦声，笑得、挖苦得楞小子也悄悄地心里甜滋滋的。

不久后，“复课闹革命”了。“战斗队”、“造反团”统统解散了，学生们闹哄着回到学校，课哪复得成？温文尔雅的老师，刚挨斗挨批，人人自危，又有甚本事胆色，叫得转那一群群刚

摆罢刀枪皮鞭，还供着“造反有理”的令箭的小孙猴子们？

我和许多黑七子女一样，没有被通知回学校去，于是只好在家闲荡。

丫头是回去了，而且听说还在军分区和学校，以造反派领袖紧跟高举的模范身份四处演讲，风头不低。

这些日子中，丫头来过楞小子的府上几次，都是说要借用自行车。每一次，丫头都是笑着来，推着自行车急忙离去，笑着回来还车子，然后又急忙离开。

来访的丫头，每一次都是从院中红棉怒放的映掩下，在摇曳婆娑的竹影中，在茉莉的淡淡花香间，微笑着走到小子跟前的。

那日子，小子年少，又怎晓得，蓝天下，和风中，此情此景，唤作“如诗如画”？

三

好景不常。

大联合、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好、山河一片红，然后到了清理阶级队伍。以人的话语作为真理的人们，乐此不疲地上演着吞噬灵魂和肉体的活剧，一次比一次更残烈、惨酷。

母亲被关到黑牢了。血统高贵、与我并肩战斗过的丫头，却是我母亲学校的红卫兵，关人的人。我是再没有资格跟丫头朝夕一起革命的了。但小子心中，却留存着寒秋夜里那一缕女儿香。

母亲被关到黑牢后不久，小子意外地又再相逢那走八字步的身形。那是一个下午，古城最热闹的市区路段。在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自行车流当中，我一下就认出了马路对面的她。穿着时兴草绿军服的丫头，也一下就认出了我。

隔着灰色的马路和无表情的人流，迸发着火花的目光，相交接在时空座标的这一点上，这是1968年10月底的一天。

她立即慢下脚步来，惊喜又错愕的眼神，穿过马路看着小子好几秒钟。

小子以一种时代所造就的不屈的奴隶面对着贵族的皮鞭般的表情，回报丫头予短暂的直接一瞥，然后继续前行。

生命那电光火石的交接！

然后，诞生在同一块美丽的土地，成长于同样甜蜜的阳光空气，孕育自同样甘香的五谷米粮，曾经是同学又曾经是战友的两个大孩子，继续被驱赶着在截然不同的方向中，举步迈往不同的人生之岸。

不过，舍不得。眼角的视线，在她的身影上还是多弥留了那么一瞬。

是的，几个月没见面了。

好像，好像有许多话要说。
但，又能说些什么呢？在这浑浊的岁月，这少不更事的年华。
这一刻，惊愕的眼神之后，她在想什么？
永恒的谜，不会有答案的。
是初恋？
初恋是什么？小子和丫头，甚至连手都没有碰过、握过。

但无论如何，也许，这就是初恋罢，甚至在这压迫的时刻，这双方因为人为的阶级黑白而被身不由己地分隔的悲惨世界。

阶级的分隔，比嗜血的钢枪、刺刀，更加无情。

时代，灵魂扭曲、是非颠倒、呼吸窒息、“将人变成鬼”的时代，不知还窒息了多少初恋？

小子在落日的映照下继续往前走去，丫头从小子的视线里很快地消失，然后，那八字步的身形，湮没在蓝色和灰色的人流和时空当中。

和许多血统高贵们一样，不久后她参军了。初恋，大概也在那时划下了终止符。

参军后，她倒是给我寄来过一封信，一封道说军营生涯，但已看不见不久前那“眼睛也好像会变得明亮起来，笑咪咪地，却似又有几分羞涩的样子”的信。也许是因“阶级立场”的缘故罢？

等着我去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

爸爸被送到干校了，我和妹妹们伴着妈妈那相去不远、却见不着面的牢狱牛棚，在自家花园里种菜养鸡糊口。还以“大无畏”的勇气，用冷眼回报周围的乐祸脸色、厉词秽语。掉眼泪，也不在人前掉。一个个寒冬一遭遭酷暑，那些日子，那些天，就这样咬着牙挺了过来。

几年后，十七岁，适龄上山下乡了。那是母亲从暗无天日的牛棚释放回家后不久。妈妈关牛棚，革命小将们把牛棚所有的缝，全给严严实实地封住，丝光不透，以中华几千年炉火纯青的斗争智慧，把个牛棚进化成为名符其实的黑狱。母亲在这样的绝对黑暗里，被关了两年又八个月。

母亲流着泪依依不舍地送走了我。带着一把提琴，还有父母妹妹们由衷的祝福，我挥别了古城和母亲，步入了社会的最黑暗、最底层。

翌年春节，我和其他知识青年们回来过年。丫头也带着英姿飒爽的女军人风采回到古城来，还相约了刀枪阵里一起进出过的故人见面座谈。内容忘了，大概不会是什么有趣好玩的话题。只还记得她轻松地说：

“不用多久你们就都要回城了。”

可是实际结果是，我整经历劫七年，除了当官外，几乎甚么都见过、干过。

那是1972年春季。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她。此后，丫头和我，相各消失在茫茫的人海和时代的长河中……

四

弹指三十多年。当年小子，早生华发，大女儿也到了她爹当年初恋的年纪。

生在长在太平洋这边的她，当然不会晓得她爹的初恋，更不明白爷爷奶奶当年为什么被无罪关牢房。

老问她爹道：“中国人怎么就恨中国人恨得起劲、恨得狠？”

“孩子，那是因为人忙着要当自己的上帝。”爹告诉她。

“……”女儿半懂不懂地眨巴着黑眼睛。

想起当年，不知怎的，也就想起了当年的丫头。并非是余情未了，实因曾经航行在“黑夜的海”（徐志摩语），你是决不会忘却那虽然转瞬即逝，但却划破了黑暗的流星的。

闭眼，似又看见了那日子的硝烟呐喊，那年头的甜酸苦楚。血河泪海，疾呼怒号，伤亡死难，呼地抢天，风驰电掣满载着斗士的解放牌卡车，城里此起彼伏的冷枪机枪声，滴滴在子弹箱和沙包上如雨的热汗，黑夜巡逻队凄厉的喝令声和杀人武器的碰击声……以及在这烈火硝烟的年代，红色风暴中，血和泪浸透了的土地上，伴着那首杀气腾腾的战歌“完蛋就完蛋”，曾悄悄绽开过的一朵并不明艳但纯洁无瑕的初恋的小花。

军伍出身，却又未够贵为太子党的格，当年的丫头，别来无恙，她今天还是在黄土地上营生罢？人海茫茫，她若是留在军中继续革命，三十多年军龄，军衔应该不会比她爹当年“两杠两星”相差多少了。若是转了业，说不准今个儿在哪当了个“长”什么的，也说不准下海发了财。

丫头与我同年，屈指应屈不惑。只是日光之下无新事，不知三十年风云变幻，至今是否真的教丫头今朝不惑？

至于当年小子，古城一别，烟雨莽苍苍。下乡七年后，小子避秦去国，负笈北美，十年寒窗，千里风云，五子登科，何足道哉。

是因见到了基督那荣光，听闻了基督的呼唤。

领教过经过当年的腥风血雨，再品过尝过跟随基督那出黑暗入光明的甘甜，基督是跟定了，功名利禄也当粪土了，没什么比基督的福泽更可贵。世事差不离，也已见过十之八九，今日中年小子，视股票王侯如无物，单单恋慕的，是基督。

但，我的同胞手足呢？我多难的故土呢？

几千年自残自伤。三十年前，拿着刀枪弹弓在自残自伤，三十年后，拿着发横财的金箍咒，还是在自残自伤。发财梦魇之中，人人都以为明天会更好了，富贵逼人来了，财神咧嘴笑了，天下要太平了。

有甚两样？三十年前操着刀枪，唱着“完蛋就完蛋”，去伤残自己兄弟；今天，今天不过是“完蛋就完蛋”地豁出去一窝蜂逐臭，彼此践踏、彼此欺骗。你看今天那贪得无厌，那大有大贪，小有小贪，无有不贪，无处不贪。古有“春城无处不飞花”，今是“中华无处无贪心”。

折腾了几千年了。中华唯一的出路，唯有能洗净人心的基督。看不到吗，中华？还要折腾上多少时日？

阔别三十载，人海中，很想与当年的丫头及众战友哥儿们一道重逢。擎杯颌首，心事浩茫，霜鬓华发，书生不老，倘促膝回首三十年前事，说乎？乐乎？半百风云路，一歌动地诗。会有这样的机会么？

更愿意与丫头细说小子半生风云，细说基督如何将仇恨和愤怒，从小子心中洗去，将爱和喜乐注入，赐小子一个新的生命和永恒的美盼。

还要告诉她，三十五年前，“完蛋就完蛋”唱罢后，小子就沉默了，其间别说唱，就连话都不能多说，以免隔墙有耳无限上纲招麻烦。自知会唱歌，乃在信耶稣得新生之后，那大喜乐，教人不唱也难。我的新歌，是“我的爱都浇奠你脚前，耶稣，因你比万有满我意……”

新生后的恋歌，恋慕的，是光明的基督。唱十九年了，恋慕不竭，恋歌不息。人的初恋，转瞬可逝，如明日黄花。基督的爱，历久弥新，甘泽心灵，四季飘香，亘古不变。

相去万里，我祈祷，愿久违了的丫头幸福，更愿她，和她一家，和我那同样久违的闯阵哥儿们、少时同学，还有梦萦中我多难的中华，我亲爱的故土，得到基督平安的福乐。

□ 寄自美国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